

中华对联史话

万明华

万明旭

编著


南天独秀

为欢度建国卅周年作
荣任梅



中华对联史话

万明华 万明旭 编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对联史话 / 万明华, 万明旭编著. —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551-0575-6

I. ①中… II. ①万… ②万… III. ①对联—文学研
究—中国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105693 号

ZHONGHUA DUILIAN SHI HUA

中华对联史话

万明华 万明旭 编著

责任编辑: 饶江何蕊
责任校对: 陈叶萍

装帧设计: 蒙晨
责任印制: 韦文印

出版人: 韦鸿学
社址: 广西南宁市东葛路 66 号
网 址: <http://www.gxkjs.com>

出版发行: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南宁市高新区科园路 62 号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字 数: 46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5551-0575-6
定 价: 50.00 元

邮政编码: 530007

印 张: 21.75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序

张利群

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不仅留下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而且拥有灿如星辰的诗词文赋，它们共同形成中华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构成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传统。对联就是中华文明宝藏中一颗璀璨夺目、异彩纷呈的明珠。如何发掘对联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揭示对联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趣，如何传承、发扬对联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意义，这是在民族复兴与中华崛起背景下学界及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万明华先生年逾八十仍笔耕不辍，集几十年之功力，精心著述《中华对联史话》一书，从“联话”研究视角对中华对联文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纵观该书全貌，可以获得大致如此的总体印象：框架完备，体系严密；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寓教于乐，意趣盎然；形象生动，事例典型；材料翔实，选文精细；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点面结合，史话一体。细读全书，特色鲜明，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因之形成明显的“联话”研究特点。“联话”类似于诗话词话之“话”的言说方式，集考证、叙事、鉴赏、评论、理论为一体，是一种言简意赅、灵活多样的文学批评类型。该书的“联话”主要着眼于对联故事以展开考证、叙事、鉴赏、评论与理论，不失为对联研究及其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从该书以“联话”视角进行中华对联史话研究而论，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所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法，以此形成该书的四个主要特点及其价值意义，以下分而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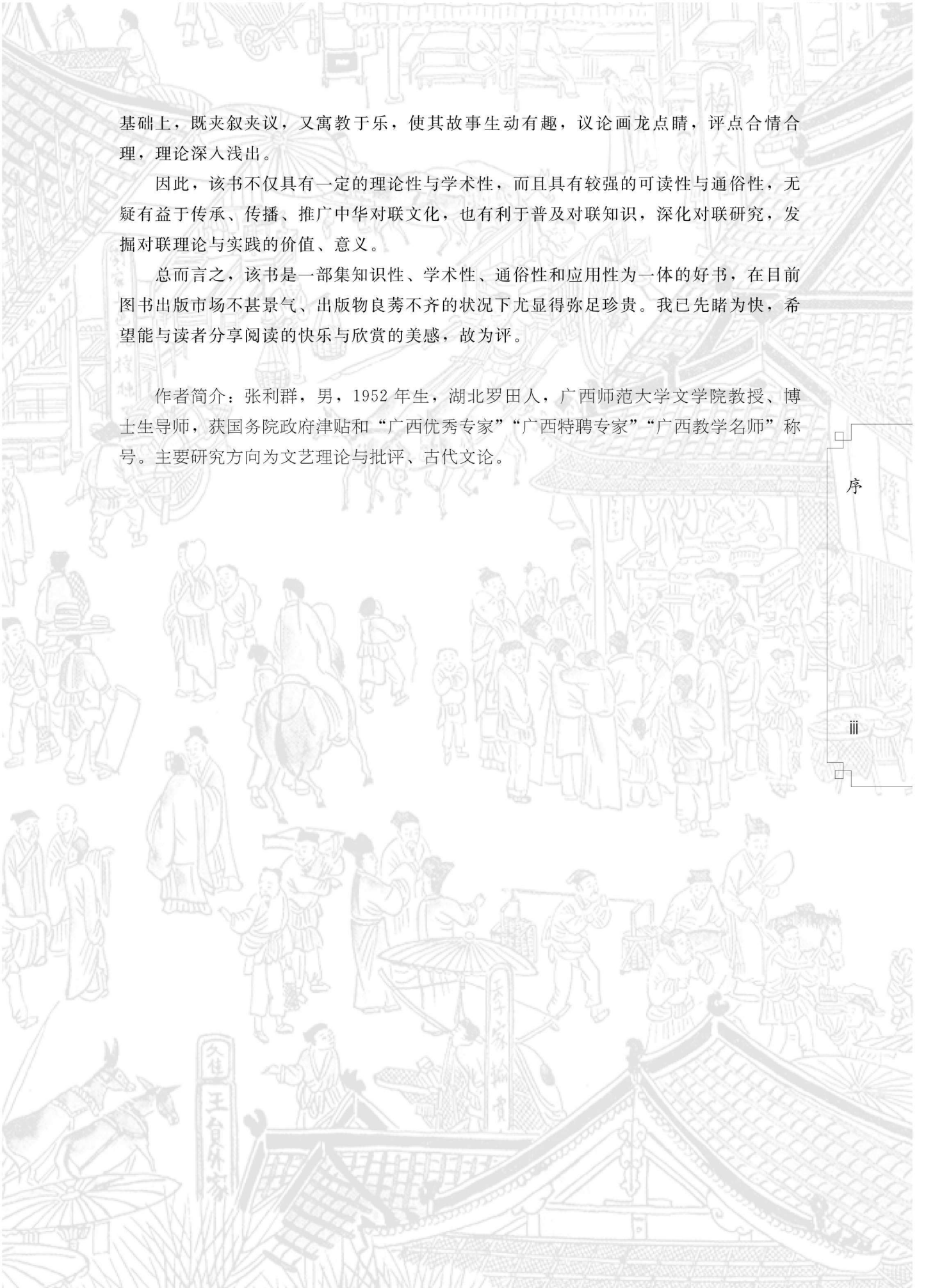
其一，“原始以表末”之溯源性批评的特点。“原始”指“原”之“始”，即探索源头、渊源、源流，亦有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之义。该书“原始”，一是探讨对联孕育、形成之渊源和缘由，提出“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桃符习俗中形成了对联的雏形”“赋的兴起促进了对联的形成”“堂室题句促进了对联的产生”等观点，分别从语言、民俗、文学、生活等不同视角探索对联产生的渊源、缘由及其背景条件；二是提出“对联源于律诗”的观点，分别从“对联源于初唐发展定型的律诗”“对联产生于盛唐”“联史纪事”等多方面进行考辨与论证，将对联产生、形成于唐代的理由以及对联与律诗的渊源关系厘清，可谓言之成理，论之有据，观点鲜明，论证严密；三是以“联话”方式，即以“说话”或“话说”诗词之本事、轶事、趣事的方式来叙述对联及其来龙去脉。该书遵循“原始以表末”的原则，纪事依据史料，联话生动有趣，故事脉络清晰，渊源有根有据，可见作者的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

其二，“释名以彰义”之阐释性批评的特点。所谓“释名”，指汉代儒生注经所形成

的考据、注解、辨证、疏义、阐释等文献研究传统。狭义指概念词义的阐释，源于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正名”，然后才能“释名”以“彰义”；广义则延伸为文本语义、文义的意趣解读与艺术鉴赏，形成中国古代感悟、鉴赏、评点式批评特征。相对于对联而言，不仅需要针对对联这一文体特征及其体制、形制、格式、规则进行阐释，而且需要从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统一中对其语义、文义进行解读，通过“释名”以彰显其含义与寓意，阐发对联生动活泼之意趣。该书关于对联，“释名”曰：“它是运用汉语言文字所造成的两组数字相等、语意相对、句式相似、对仗工整、音韵协调优美的句子或短文。”一方面，以此彰显对联在抒情、叙事、写景、状物、说明、议论、咏史、哲理等方面的思想文化内容及其意趣，另一方面凸显对联之“对”的形制特点，“最显著特征，就是在于它的上联和下联，从数字、句式、词性，到平仄、韵律等，全用对偶表现手法”，构成其体裁、语言、结构、音律、表现手法等形式美，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依托对偶之渊源而生发的对称、平衡、均匀、整齐、协调、韵律、声律等形式美原则，揭示出对联的深层内涵及其审美魅力。

其三，“选文以定篇”之选文批评的特点。“选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亦可谓之“选本批评”。中国古代文学第一部选本《诗经》，如果不是采用“选文以定篇”的方式，不仅难以保存弥足珍贵的先秦歌谣资源，而且也难以成就《诗经》的经典地位。选文、选本之所以为批评，是因为依据了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其选文、选本的标准及其评价取向。因此，选文、选本无疑也是批评的一种类型。该书对于“联话”材料的选择，也是依据一定的选文准则，即真善美的标准，既能够坚持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统一的原则，也能够遵循思想性、审美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更能够体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该书基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依循历时性的纵向线索以呈现各历史时期对联发展的阶段性概貌，继而以“联史记事”中所叙述的一个个故事揭示出彼此关系及其历史逻辑；另一方面通过“联话选读”，以典型案例进行夹叙夹议的阐释、解读与鉴赏，阐发对联故事的深刻内涵与多样化意趣，揭示其人其事、其景其物、其史其论的内在逻辑与结构关系，由此构成历史与逻辑统一之“联话”的整体性、系统性。

其四，“敷理以举统”之理论分析的特点。所谓“敷理”，指逐层递进、由浅入深、环环相扣的推理、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与议论、分析、析理、思辨、比较的理论方法，由此达到举一反三、以一总万、纲举目张的理论建构及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如针对对联与律诗的关联，作者论证：“由于它（律诗）讲究平仄相间，音韵和谐，便产生了‘对仗’和‘对偶’的概念，因而便有了‘联’的意义。由于对偶和声律的运用达到了一定程度，便产生了律诗，而对联便是从律诗中发展而来，从律诗的颌联和颈联脱胎而来，是律诗的颌联和颈联的扩大、缩小或灵活运用。”这一论述可谓言之成理，推理严密完备，论证符合逻辑，使其理论分析与批评阐释为该书增色不少。此外，该书采用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批评方式，以“联话”将说理蕴含于故事之中，将议论寄托于叙事



基础上，既夹叙夹议，又寓教于乐，使其故事生动有趣，议论画龙点睛，评点合情合理，理论深入浅出。

因此，该书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学术性，而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通俗性，无疑有益于传承、传播、推广中华对联文化，也有利于普及对联知识，深化对联研究，发掘对联理论与实践的价值、意义。

总而言之，该书是一部集知识性、学术性、通俗性和应用性为一体的好书，在目前图书出版市场不甚景气、出版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尤显得弥足珍贵。我已先睹为快，希望能与读者分享阅读的快乐与欣赏的美感，故为评。

作者简介：张利群，男，1952年生，湖北罗田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津贴和“广西优秀专家”“广西特聘专家”“广西教学名师”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古代文论。

前言

1932年夏，我出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个偏远的农家。祖父万文卿是教了一辈子私塾的老先生，他是家乡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才子，吟诗作对总拔头筹，颇受人尊重，至今家乡老百姓还传诵着他和当时的贵州才女方凤珍对对子的故事。我父亲万仁孚，只随祖父读了三年半私塾，但他天资聪颖，不但毛笔字写得好，吟诗作对也小有名气。我家种几亩田过日子，家境清贫，传承着崇文重教的家风，在乡里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

我在1939年破蒙读书了，这时，教了30年私塾的祖父已退休在家，晚上我随老人家睡。白天，我一有放牛或看晒场的机会，他总是陪伴着我，大概是他认为“孺子可教”吧，总是寻找机会向我“灌书”，给我讲些古诗文或对联故事。如“吕蒙正题联抒愤”“东坡巧对克辽使”“苏小妹三难新郎”等，老人家讲得兴味盎然。于今回忆起那些“移椅倚桐同玩月，点灯登阁各攻书”“豆出土皮，合掌叩天求雨露；莲生水面，开心捧日笑风云”等联话故事时，祖父的音容宛若还在。慈父万仁孚也像祖父一样，除了经常和我讲诗词、对联故事，还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英雄的故事，教育我爱国、爱家、勤奋读书。父亲还勉励我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你能好好读书，将来能为国做事，不管你走多远，就如同在爸爸身旁，爸爸脸上有光，你也不枉此一生。”在祖、父辈的调教下，联话中的智慧和文学因子就像一只火鸟，已经进入我的心灵筑巢了。于是，读书、学对联、做人、忠于祖国、报效祖国也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一直鼓励着我、影响着我。

1955年夏天，我从陆川高中毕业，通过高考，被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来到独秀峰下读书。1959年毕业留校，分配到广西师范大学附中当高中语文教师。

青年学子教书，生怕自己浅薄，以致误人子弟，因此，我很注重充实自己。每每节假日上街，我总是来到桂林市三多路口的新华书店看书。我买的也多是与语文教学和对联学习有关的书。我教书从不马虎，不敢有负于国家。功夫不负有心人，时至1965年高考，我所教的高中二十九班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广西第一。

由于我从小喜欢听对联故事，20世纪60年代，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阅读对联书籍。70年代以后，我开始购买对联辞书，订阅对联杂志，积累、研究对联的资料。到了80年代末，我积累的对联图书资料已有两三个书架，计划退休后编写一本对联史话。

1992年秋，我从广西师范大学附中退休，做了几年准备工作后，于2001年开始编写《中华对联史话》。自唐至现代的联史，其内容均由三部分组成：“联史概述”，概括

论说对联于当时的发展状况；“联史记事”，大致按年代顺序，录下联家的生平和作品；“联话选读”，选取若干流传较广的优秀联话故事，既可作联史佐证和补充，也可增强联史的可读性。

从2001年到2004年，我精神尚好，情绪较高，又很勤奋，更由于我对唐、宋、元、明几代的联史早有研习，所以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只花了几年时间就完成初稿。然而，正值我奋战正酣之际，2004年夏天，我妻子突患脑溢血后遗症，不能举步，生活不能自理，请保姆自然少不了，家里家外需我操持的事也实在太多，编写之事几乎难以为继。2008年，有幸请到涂阿姨，她护理病人尽心，料理家务尽责，我又可以专心舞弄我的笔墨了。然而，岁月催人，日见迟暮，戴着老花镜爬格子已深感力不从心了。然而为了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不成此志，又岂能罢休！“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我自觉勉励自己，坚持夜以继日，勤奋不辍。

进入清代，对联发展已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对联妙手辈出，长联不断涌现，研究对联的著作、探讨对联发展的“联学”应运而生，梁章钜、梁恭辰父子的《楹联丛话》系列丛书也于1840年在桂林出版了。据有关统计，清代出版的联话、集锦和个人作品集等各种联书就达300多种。由于对联被广泛使用，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更为显著了。

到了近代，对联的社会功能表现得更广泛和突出。虽然这一时期在时间上与清代和民国有重叠，但那些反映农民起义思想、活动的太平天国对联，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鸦片战争对联，义和团运动对联和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民主革命对联，都极具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革命精神，因此单列成章。我在编写过程中，始终根据对联文化的发展进程，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史实，尽可能多地遴选那些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关的、闪耀着爱国爱民思想光辉的联作编入史话。

民国时期的对联，包括辛亥革命对联、五四运动对联和抗日战争对联……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开始的抗日活动及从1937年至1945年的全国性抗战中，对联始终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的锐利武器。其内容有揭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有激励民众斗志的、有悼念阵亡将士的、有痛斥投降派的、有欢庆抗战胜利的等。对联的作者，有平民百姓，也有抗日将领，如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各民主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和八路军也同群众一起写下了许多抗战杀敌对联。这些联作是中华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英勇血战的重要史料，我恭谨录下，以警我中华，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奋勇前行。

经过12年漫长的艰苦劳作，至2013年底，我终于完成《中华对联史话》的编写，此时顿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为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以对联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参阅了《中国对联大辞典》《楹联丛话》《巧对录》《古今对联大观》《中国名联辞典》《名人对联故事大观》《对联艺术》《中国古今巧对妙联大

观》《宋代楹联集要》《归田录》《对联话》《民国名联》《古今谭概》《中国近·现代史联话》《东坡轶事》《历代名人名联鉴赏》等几十种典籍和报刊，从中获取知识和资料，日积月累，孜孜不倦地编写。本书能够如愿编写完成，实有赖于上述方家大作，在此特致谢忱！

我把书稿写完后，得到胞侄万德焕的鼎力相助。他利用业余时间，将我的原稿打印成册。从2008年至2012年，他劳累了3年多，真是有劳他了！

书稿成册后，我交胞弟万明旭做了修改和补充。明旭弟1982年毕业于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诗词、历史、书法等方面都有广泛涉猎，古典文学知识基础较好。他为此书也劳累了3年，对原稿做了不少有益的修订和补充，理当是本书的编著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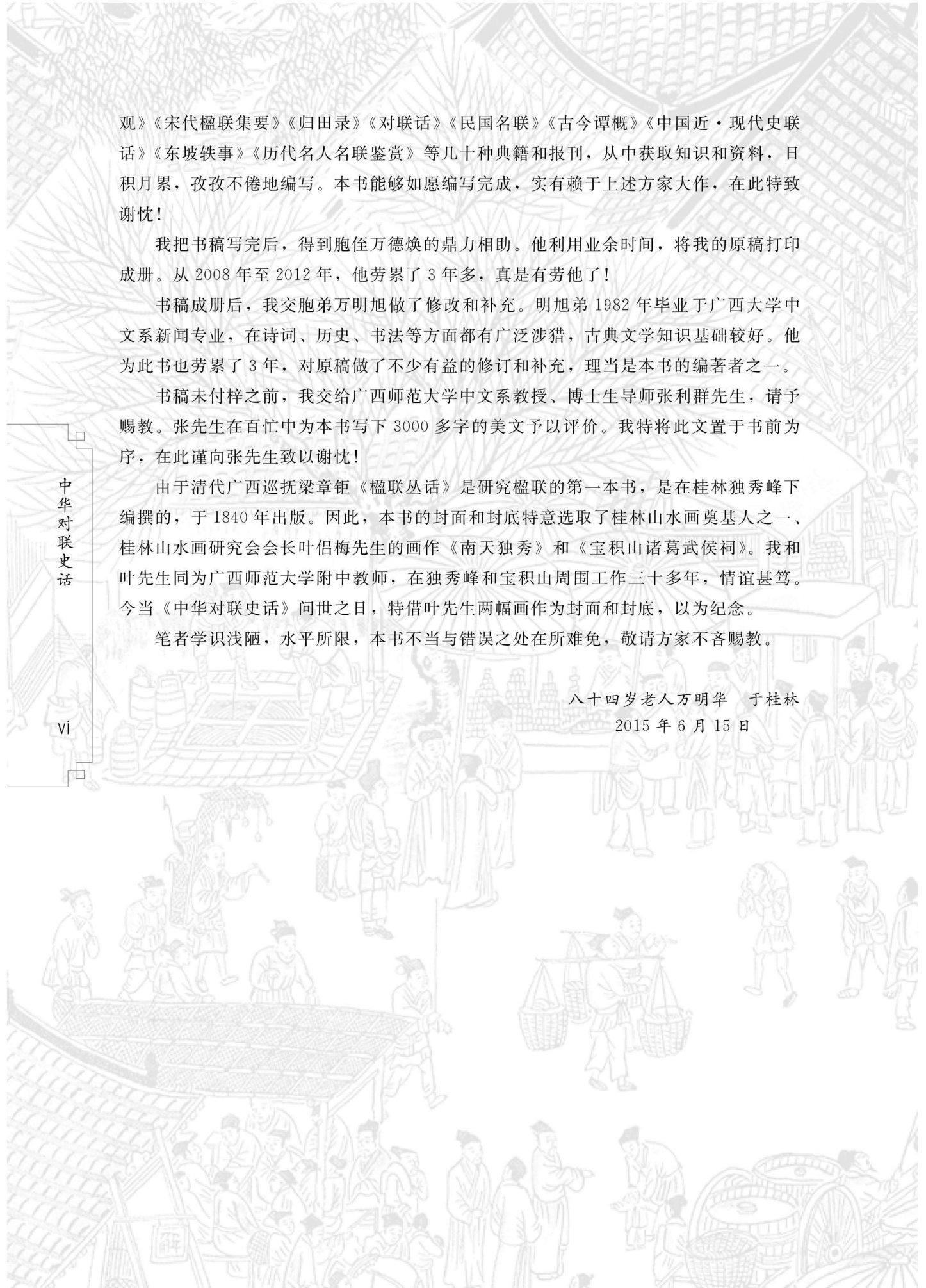
书稿未付梓之前，我交给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利群先生，请予赐教。张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下3000多字的美文予以评价。我特将此文置于书前为序，在此谨向张先生致以谢忱！

由于清代广西巡抚梁章钜《楹联丛话》是研究楹联的第一本书，是在桂林独秀峰下编撰的，于1840年出版。因此，本书的封面和封底特意选取了桂林山水画奠基人之一、桂林山水画研究会会长叶侣梅先生的画作《南天独秀》和《宝积山诸葛武侯祠》。我和叶先生同为广西师范大学附中教师，在独秀峰和宝积山周围工作三十多年，情谊甚笃。今当《中华对联史话》问世之日，特借叶先生两幅画作为封面和封底，以为纪念。

笔者学识浅陋，水平所限，本书不当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八十四岁老人万明华 于桂林

2015年6月15日



目 录

序

前 言

概 说

对联的孕育和形成

一、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

二、桃符习俗中形成了对联的雏形

三、赋的兴起促进了对联的形成

四、堂室题句的传统促进了对联的产生

唐代对联

一、联史概述

二、联史纪事

三、联话选读

宋代对联

一、联史概述

二、联史纪事

三、联话选读

元代对联

一、联史概述

二、联史纪事

三、联话选读

明代对联

一、联史概述

二、联史纪事

三、联话选读

1

2

2

2

3

3

5

5

9

11

18

18

19

31

46

46

46

48

51

51

52

78

目
录

vii

清代对联	103
一、联史概述	103
二、联史纪事	105
三、联话选读	144
近代对联	190
一、联史概述	190
二、联史纪事	191
三、联话选读	225
现代对联	244
一、联史概述	244
二、联史纪事	245
三、联话选读	324

概 说

对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它是运用汉语言文字所造成的两组数字相等、语意相对、句式相似、对仗工整、音韵协调优美的句子或短文，是写于纸上，贴在门旁，或刻在柱子、器物上，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它运用对偶的表现手法，把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丰富的生活内容加以锤炼、浓缩和概括，是具有很强表现力的文学形式。对联是从律赋、律诗中产生出来，又独立于其他文艺的一朵奇葩。

汉语在各国语言中独具特色，它一字一音，一音一义。一个个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音节分明，声调匀称，因而易造成字形、字音、字义两两相对并整齐优美的句子或短文。所以，对联是汉语独有的文艺形式。

对联又名楹联、联语、对子、楹贴等。诗的单位叫“首”，文章的单位叫“篇”，对联的单位叫“副”。一副对联由数字完全相等的上下（前后）两部分组成。上部分叫“上联”，又叫“出句”或“对头”；下部分叫“下联”，又叫“对句”或“对尾”。

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上联和下联，从数字、句式、词性，到平仄、韵律等，全用对偶表现手法。

对联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它常常是汉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合体。千百年来，智慧的历代中华儿女继承泱泱大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创作了浩如烟海、无以计数的对联佳作。它较之其他文学样式，读者面更广、应用性更强。

从山庄窝铺到皇帝宫廷，从富户的厅堂到穷人的茅舍，从贺婚庆寿到吊丧悯死，从庙宇亭榭到名胜古迹，无处不见表达各种不同情感的对联。节日、喜日贴出一副对联表示喜庆；祝寿送上一副对联，表示诚挚的称颂和祝福；有人逝世了，献上一副挽联以寄托哀思。在风景名胜區，描摹景色，摄取风情，挂上一副既富诗情又具画境的对联，也能助人领略山光水色。它与祖国的名山大川、胜地佳境相映生辉，放射着奇异的光彩，奇伟瑰丽！

对联的孕育和形成

一、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

对偶是“对仗”和“骈偶”两个词的演化和综合。对仗，起源于古代宫室中卫队的行列（仪仗）。这种仪仗队是两两相对地排列的，所以叫对仗。“骈偶”一词的“骈”，指两匹马并驾齐驱，“偶”指两个人结合起来。合成“骈偶”，即成双成对之意。“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就是对偶修辞手法的特点。

对偶修辞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文中很早就使用了。如我国最早的民歌《弹歌》中“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具有对偶的形式；《易经·系辞》就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类的对偶句；《尚书》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对偶句；《击壤歌》中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等极其工整的对偶句；《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对偶句；《老子》中也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对偶句；屈原的《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对偶句；在荀子的《劝学篇》中，像“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之类的对偶句俯拾皆是。因此，我们可以说，古诗文的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

汉魏以来，人们在平日的交往中也有喜用对偶句的习惯。如西晋时，一日，文学家陆云（262—303年）与著作家荀隐在西晋大臣、著作家张华家宴席上初次相遇，因互不认识，荀隐脱口而出，自我介绍：

日下荀鸣鹤

陆云听了，不假思索，亦于席上举手自我介绍：

云间陆士龙

西晋的陆云和荀隐初次会面时的“脱口秀”就是一副艺术性颇高的人名对。士龙、鸣鹤分别是二人的字，构成了天然的对语。古人说，“风从虎，云从龙”，所以才思敏捷的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辞源》有云：“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因以皇帝所在之地为日下。”所以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因为陆云是松江（今上海）人，后来上海又因此得到一个雅称——“云间”。这两人的自我介绍恰似一副天成巧对，饶有韵趣。虽然这些数字相等、结构对称、意思相应的语句还算不上名副其实的对联，它只是各人自我介绍的“共语”，是应对形式，但已经具备了对联的基本特征，所以人们认为这就是中国对联的起源了。

二、桃符习俗中形成了对联的雏形

在古代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在东海度朔山的一个山洞

里，囚禁着妖魔鬼怪。这个山洞的东北面有一个出口，出口处植有两株大桃树，枝繁叶茂，盘曲三千里。树下有鬼门，万鬼由此出入。天帝派出性能执鬼的“神荼”和“郁垒”两位神仙倚树把守，凡是看到有想逃出去作孽害人的恶鬼，两位神仙便用苇索把它捆起拿去喂虎，吓得恶鬼不敢逃遁。当时人们可能由此得到启示，便在除夕之夜扎桃人、执绳索，并在门上画虎，以此吓鬼镇邪。后来人们觉得扎桃人、画虎麻烦，改用桃符以镇鬼辟邪。

又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记载，桃符是一寸多宽、七八尺长的桃木板做成的器物，每年除夕把它钉在大门两侧，用以镇邪，一年一换。这种桃符习俗盛行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习俗也有演变过程，原先是在桃木板上雕刻“神荼”和“郁垒”两位神仙的形象，后来人们觉得雕刻费时费事，改为画像，再后来干脆写上“神荼”和“郁垒”两位神仙的名字便是。在这种桃符习俗中形成了对联的特定形式。

三、赋的兴起促进了对联的形成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叫作“赋”的文学体裁兴起，它兼有诗和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和韵律，对偶修辞手法得到广泛和自如的运用。例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绿）波。”（曹植《洛神赋》）又如“舟凝滞于水滨，车透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诘前，马寒鸣而不息。……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江淹《别赋》）再如“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吴均《与朱元思书》）这里所引的骈体文句，都是用对偶、排比句写成。这些对偶的上句和下句，不仅字数相等，而且在句式、词性、内容上都对得十分工整和精巧。这种对偶修辞手法，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达到了成熟和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丰富的技巧和固定的修辞格。其特点，一是句法上讲求对偶，偶句的句子结构、词性和奇句相互对仗，句子的字数也渐渐趋向骈四俪六；二是讲究声律，要求平仄配合，音节回环往复，讲求形式华丽等。而且齐梁时期提倡对偶和声律，已经形成了律诗的前驱——“永明体新诗”。

四、堂室题句的传统促进了对联的产生

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文人的堂室题句很多，如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孔北海的“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等句皆似联语，只是还未贴在门旁或墙上，还未移用到屋前柱子上，未称为对联而已。

据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载，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481—539年）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其门：

闭门罢庆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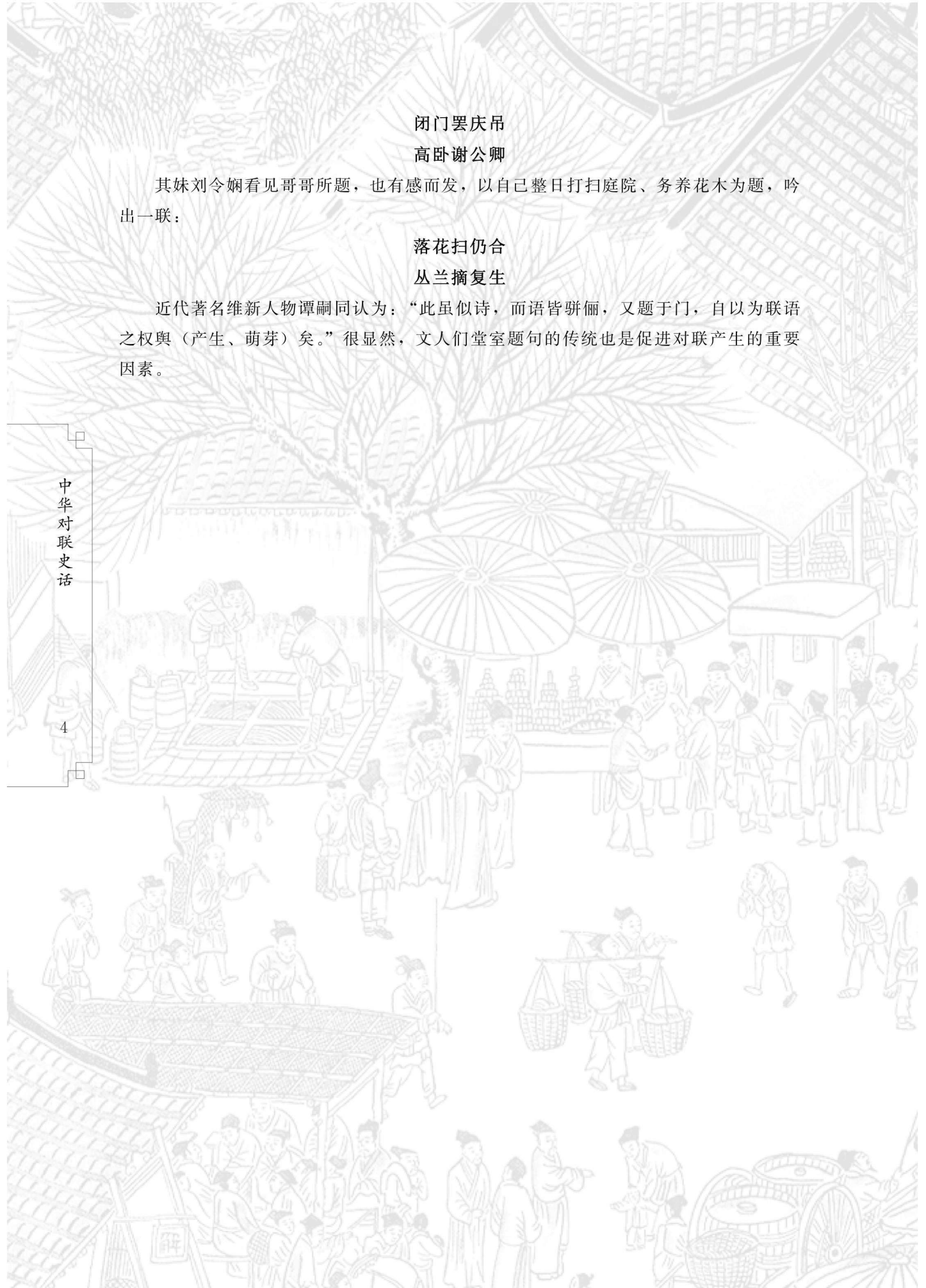
高卧谢公卿

其妹刘令娴看见哥哥所题，也有感而发，以自己整日打扫庭院、务养花木为题，吟出一联：

落花扫仍合

丛兰摘复生

近代著名维新人物谭嗣同认为：“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以为联语之权舆（产生、萌芽）矣。”很显然，文人们堂室题句的传统也是促进对联产生的重要因素。



唐代对联

一、联史概述

从文学艺术史和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来看，对联这种文艺形式同整个汉语言艺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是随着汉语言文学艺术中的对偶修辞手法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应运而生的。从对联本身来看，它句式灵活，长短自如，无固定篇幅，少则几个字，多则几十个字甚至更长；它虽然是“诗”，却不强调押韵；它注意文字的修饰和用典，是从初唐发展定型的律诗中脱胎出来的独立别致的文体。

这种初唐发展定型的律诗，是南朝齐永明年间（483—493年）在沈约等人的倡导下创作的一种“永明体新诗”。这种新体诗要求按汉字的四种声调（平、上、去、入）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的声、韵、调配合，以避免声韵不协调的“八病”，达到平仄协调、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的艺术效果。这种永明体新诗的出现标志着古典诗歌已经从比较自由的形式向讲求格律的近体诗转变。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又经过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努力创作，到了武则天时期（685—700年），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在声律方面的经验，把律诗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这种发展定型的律诗，分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每首律诗有四联，即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第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一首有十句以上的诗又称为排律，因它要求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且有一定的平仄，用韵也有一定规矩，古称之为律诗。由于它讲究平仄相间，音韵和谐，便产生了“对仗”和“对偶”的概念，因而便有了“联”的意义。由于对偶和声律的运用达到了一定程度，便产生了律诗，而对联便是从律诗中发展而来，从律诗的颔联和颈联脱胎而来，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的扩大、缩小或灵活运用。

由此可见，对联源于初唐发展定型的律诗，是从律诗的颔联和颈联脱胎而来的，它源于律诗但特点鲜明，别具风格。它作为一种对仗对偶的骈丽文体从律诗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艺形式，从产生时起就深受人们的喜爱。

一般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代，因为当时对联已经大量出现、大量使用，且有很多史料可以佐证：

①2002年春，湖北省民间文艺工作者从武汉市江夏区的《灵泉志》中发现了唐朝李道宗（600—653年）的一副34字长联。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被封为江夏王。他于江夏灵泉寺筑建紫萼园，在园中隐居数年。李道宗所撰灵泉寺大门联为：

深山窈窕，水深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问渡
远树苍凉，云起鹤翔藏妙理，惟偕骚客搜奇

李道宗这副园林联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对联，比蜀主孟昶所撰“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早三百多年。

②据有关记载，藏于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鼎的对联墨迹，为唐太宗（627—649年在位）御笔亲题。联曰：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③据《西湖灵迹》记载，骆宾王（638—？）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失败后隐居灵隐寺时，曾对宋之问（656—713年）一联，曰：

峰边树色含风冷
石上泉声带雨秋

④1991年，敦煌研究院的谭婵雪女士在《文史知识》第四期上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文中说到，她在一卷写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的《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启颜录》抄件的背面发现一些联语，录有如下几副：

三阳始布
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
寿禄延长

（以上为岁日对联）

铜浑初庆垫
玉律始调阳

年年多庆
岁岁无灾

门神护卫
厉鬼埋藏

（以上为立春日对联）

这些字数相等、结构对称、意思相应的语句，既用于节庆，又上下对仗，讲究平仄，无疑就是对联了，而且为开元十年以前的作品。

⑤据《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唐开元十六年（728年），玄宗曾令宰相张说试李泌一联，曰：

方若棋盘，圆若棋子
动若棋生，静若棋死